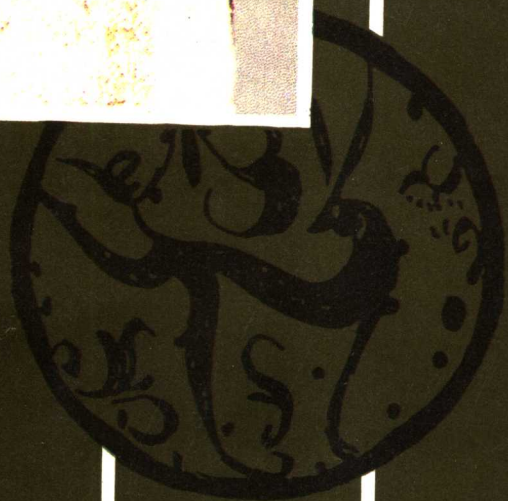


李渔新论



沈新林 著



李 渔 新 论

沈新林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顾振亚
封面设计 吴 钰

李 渔 新 论
沈新林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苏州市十梓街1号 邮编:215006)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东台印刷总厂印装
(地址:东台市鼓楼路 邮编:2242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5 字数 285 千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1037-319-6/I·13 定价:18.00 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导论 一代悲剧的天才——李渔·····	(1)
---------------------	-------

家世生平

李渔出生地考略·····	(17)
论李渔的改名易字及其思想转变·····	(31)
李渔金陵事迹考·····	(42)
“莫愁钓客”考·····	(65)
李渔家室考·····	(69)

思想品格

论李渔的思想意识·····	(85)
论李渔的品格·····	(100)
论李渔的文学观·····	(114)
无声戏：李渔的小说观·····	(130)

文化建树

芥子园浅探·····	(143)
芥子园再探·····	(153)
论李渔的育才之道·····	(165)

千古绝对，一字难移

——李渔与楹联文化…………… (178)

李渔：中国最早的专业作家…………… (189)

千载上下期相匹

——李渔与李白…………… (204)

戏曲创作

论李渔戏曲的时代特征…………… (221)

《风筝误》新探…………… (234)

论李渔的喜剧艺术成就…………… (247)

“稗官为传奇蓝本”

——李渔的小说与戏曲比较研究…………… (261)

小说创作批评

《合锦回文传》刍议…………… (277)

《肉蒲团》作者考索…………… (291)

李渔评点《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考…………… (306)

论李渔小说中的自我形象

——兼论自我寄托的创作方法…………… (319)

论李渔小说的情节艺术…………… (333)

凌虚摭实，写照传神

——李渔文言小说漫议…………… (345)

后记…………… (357)

导论 一代悲剧的天才——李渔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悲剧和天才似乎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封建帝制刚刚在神州大地上萌生，上帝就悄悄拉开了天才作家们悲剧命运的序幕。首开我国个性化文学先河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曾两次遭到放逐，最后怀石自沉于汨罗江。古代散文最高成就——《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虽然头戴“伟大的文学家”和“伟大的历史学家”两顶桂冠，但生前却惨遭腐刑，在羞辱惶恐之中度过了余年。被誉为唐代诗坛上双子星座的李白和杜甫，一个才气横溢而终生怀才不遇，一个生前潦倒不堪，死后不得归葬，遗体还在异乡漂泊了四十三年。元代伟大戏剧家关汉卿创作了六十多部杂剧，而毕生只是个地位低下的“书会才人”。清朝伟大的文学家曹雪芹则在饥寒交迫中创作了传世巨著《红楼梦》，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人世！

这些现象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到底是天才离不开悲剧，还是悲剧造就了天才？

其实，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悲剧的命运不仅常常伴随着这些第一流的天才，而且任何天才都与悲剧有着与生俱来的缘分。有些天才生前受到命运的摧残，死后还遭到世俗的非议和不公正的评价，明末清初的大文学家李渔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位。

天才的悲剧

李渔(1611—1680),原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中年改名为渔,字笠鸿,号笠翁。人们习惯上称他李渔、李笠翁。他祖籍浙江金华府兰溪县,出生在一个医药两兼的商人家庭。也许是为了扩大财源的缘故,他们家族中许多人外出经商。李渔的父亲李如松和伯父李如椿就长期在位于长江北岸的江苏雒皋(今如皋)从事医药生意。李渔便诞生在苏北文化古城如皋。

少年时代的李渔生活优裕,樽中有酒,眉梢无愁,一头钻在书卷之中,潜心读书,诗书六艺之文无不毕览。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他对于医药之道也颇多涉猎。此外,他还常随父辈出入于达官贵人之家,因而学问大有长进。正当他在知识的海洋中尽情地遨游,朝着科举功名的理想高峰奋力攀登的时候,却遭到了悲剧命运的第一次打击。19岁那年,他的父亲突然被疾病夺去了生命,全家失掉了经济来源。由于他的哥哥李茂已先期死去,葬在如皋,生活的重担就落在了并不成熟的李渔的双肩之上。经过反复的考虑,他既不愿意继承父业,又不可能在如皋另辟财源,只有举家撤回原籍。尽管李渔对孕育他文学细胞的古城怀着深深的眷恋,但不容回避的严峻现实使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他在为父服丧守孝期满之后,终于告别生活过二十余年的如皋城,回到了浙江兰溪。

应该说,他作出回原籍的决策还有别的考虑,那就是参加科举考试。他自觉学有所成,也到了应试的年龄,而当时规定士子应试只能在原籍,若冒籍在外地考试,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崇祯八年(1635),25岁的李渔在婺州(今浙江金华)参加了童子试,深受主考官许豸的赏识,许豸誉李渔为“五经童子”,并且把他的试卷印为专帙。李渔首战告捷,喜悦之情自不待言。但是,等待

着他的却是黯淡的前途。崇祯十二年（1639），他赴省城杭州参加乡试，结果名落孙山。这当头一棒打得他晕头转向，但他仍不死心，准备再次应试。三年后，他在应试途中听到警报，道路被阻，只得折回。他感到茫然，为什么命运老是与他开玩笑？他找不到其他答案，只能归之于“天命”了。他在《应试中途闻警归》一诗中写道：

正尔思家切，归期天作成。
诗书逢丧乱，耕钓俟升平。
帆破风无力，船空浪有声。
中流徒击楫，何计可澄清？^①

人生道路上接二连三的打击使他心灰意懒，“帆破风无力”正是他当时心态的写照。他无计可施，只有寄希望于升平时代了。显然，他开始悟出人生的哲理，那种跃跃欲试的豪情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都逐渐从他的心灵深处消失了。

祸不单行。科举道路既走不通，太平的日子也与他背道而驰。明朝末年农民起义的浪潮风起云涌，封建统治阶级惶惶不可终日，加紧派官兵镇压，狼烟四起，烽火连天。浙江金华兰溪一带战火纷飞，兵荒马乱，人民东躲西藏，苦不堪言。李渔不可能区别农民起义和官兵的不同性质，称起义军为“贼”，这无疑表现了他身上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他仅仅是因为宁静的生活受到干扰，被迫奔走避难而一概厌恶战争而已。不久，清兵入关，明朝倾覆。改朝换代在这个熟读诗书的正统文士的心灵上划了一道深深的伤口，这不仅是由于他的寓所毁于兵火，更重要的是他希望为之效忠的明王朝也为异族所取代。他简直绝望了。

为了维持生活，无家可归的李渔应金华同知许檄彩的邀请，担任幕僚。李渔觉得这是一次入仕和建功立业的机会，心中再一次燃起了希望之火。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丧家何处避烽烟，一榻劳君谬下贤。
只解凌空书咄咄，那能入幕记翩翩。
时艰借箸无良策，署冷添人损俸钱。
马上助君惟一臂，仅堪旁执祖生鞭。②

诗中引用祖逖挥鞭北伐的典故，借以抒发自己恢复中原的壮志。然而，他又一次失望了。顺治三年（1646），清兵由阮大铖等明朝降将带领，攻克金华，府治为兵火所焚，到处一片废墟，许檄彩逃走，李渔避居深山，结束了为期两年的幕僚生活。此时，他在金华已无处安身，只得返回故乡兰溪。满目焦土，遍地荒凉，他伤心透顶，特别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削发令严重地损害了他的民族自尊心。他不能保发弃头，但却深深感到耻辱。“骨立先成鹤，头髡已类僧”③，他心头的一丝火光完全熄灭了。

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都笃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信条，在山穷水尽之际，李渔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买山归隐。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总算在“伊山”结了几间茅屋。房屋虽不宽敞，但因他设计精巧，也能因陋就简，别具一格，不仅颇有田园风味，而且很富诗情画意。此时，他改名为渔，号笠翁，表明了归隐的心迹。然而，他“归农学圃”还只限于种花植草，引泉灌竹，即使偶尔躬亲劳作，也只是为了陶冶性情，淡忘世事，而内心深处却十分矛盾。就这样默默无闻地生活下去吗？满腹的经纶难道就付之东流了吗？“不能。”他发出微弱的呼喊。这时，他一家的生活又面临危机。困难的处境促使他下定决心，远走高飞。他隐居三年多以后，在41岁前后，卖掉了伊山别业，来到繁华的杭州，开始了“卖赋以糊其口”的生活。

李渔在杭州期间，尽管文思泉涌，创作力特别旺盛，一连创作了拟话本小说集《无声戏》一、二集，《十二楼》和《风筝误》、《怜香伴》、《奈何天》、《蜃中楼》、《意中缘》、《玉搔头》等多种传奇，但卖文仍不足以糊口，有时还要靠借债过活。于是，他决计

移家金陵。

顺治十八年(1661)前后,李渔来到六朝古都,卜居秦淮河畔,继续从事写作,完成了《十种曲》的其余几种(《慎鸾交》、《比目鱼》、《凰求凤》、《巧团圆》)以及《论古》、《笠翁诗韵》等著作,其中以《闲情偶寄》最负盛名。

他营建了芥子园书铺,不仅刻印他自己创作的诗文、传奇、杂著及手编的工具书,而且还印行《水浒传》、《三国志演义》等通俗小说。他自己设计印制的信笺也名传遐迩。

李渔想摆脱贫困,但贫困偏偏找上门来。他移居杭城时全家八口人,生活状况并不景气,而年近半百的李渔还有一大心病,就是还没有一个儿子。后来在五十岁那年喜得一子,对此李渔高兴得难以言状,自称“十年霜鬓黑今宵”^④。哪知此后一发不可收,一连生下七个儿子,有时一年生两个。人口陡添增加了李渔的经济负担,尽管他日夜不停地写作,但收入毕竟有限;书铺生意虽然不错,却因刻板精致,印工优良,成本昂贵,盈利也十分微薄,加之他人翻刻冒印,更影响了声誉和利润。李渔入不敷出,债台高筑,生活十分艰难,不得不考虑另谋生计。李渔毕竟头脑聪明,他决定发挥自己通晓音律的特长,自办家庭剧团,亲自担任导演,以演出他自己创作的《十种曲》为主,也演一些经他改编的传统戏剧。这样,他开始了当时认为是“贱业”的卖艺生涯。剧团是他与达官贵人之间最好的媒介,他的剧团能满足贵族官僚的声色之好,因而也能得到他们的报酬和馈赠,借以维持全家的生活。

李渔寓居金陵期间,大部分时间是带着家班女戏周游各地,先后到过北京、陕西、甘肃、山西、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湖北、安徽、河北等地,所到之处,受到人们的欢迎。他以戏会友,结识了不少文人学子、达官显贵,其收入亦能勉强对付全家的衣食所需,自己还能观赏各地风景,游览名胜古迹。但是,他四处奔波,也深感疲劳;尤其是所操“贱业”为人所不齿,自有压抑

之感。在京师时，他曾于寓所门上书“贱者居”三字，借以自我解嘲。^⑤由此可见，他的心里确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悲伤。

年逾花甲的李渔被生活的重负压得喘不过气来，他已心力交瘁，没有勇气再去搏击生活的风浪，只想找一个安静的归宿。康熙十五年（1676），他在浙江地方长官的帮助下，倚云居山，傍西湖建造了层园，然后举家离开居住二十年之久的金陵，迁到如诗如画的西湖边定居。这次搬迁使李渔大伤元气，他把金陵芥子园及他生平著述的书版和妻妾的簪珥、衣服都抵押偿了债。为此，李渔陷入了贫病交加的困境，连修订《一家言》的工作也难以继续下去。他不得不伸手向京师的朋友求援，他写的《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情真意切，声泪俱下，扣人心弦，读之令人不能不一掬同情之泪。这里与其说他是“打抽丰”，不如说他是在控诉那扼杀人才的社会。

晚年的李渔老弱多病，但他安贫乐道。在安静恬淡的环境中，他继续整理编辑文稿，勤奋写作，为自己的诗文集作序，也为别人的书画写序。正当他准备完成新的写作计划之际，这个饱尝辛酸、历尽坎坷的古稀老人在康熙十九年（1680）正月十三日溘然长逝，结束了一生的悲剧命运。他被葬于西湖边方家峪九曜山之阳，实现了“老将诗骨葬西湖”^⑥的宿愿。

悲剧的天才

悲剧的命运戕害了天才，也造就了天才。李渔的一生充满激流险滩，他像一叶没有舵桨的小舟，被打得东飘西荡。然而，他天才的光辉却被惊涛骇浪冲刷得更加耀眼。他留下的等身著作，成为中国文化宝库中一颗颗闪光的明珠。

李渔自幼天资过人，乳发未燥即能辨四声，“襁褓识字，总角成篇，于诗书六艺之文虽未精穷其义，然皆浅涉一过”^⑦。他不仅

聪颖，而且勤奋，曾寓居离如皋城四十五里的李堡镇，在海边的老鹤楼读书^⑧，17岁时写的《丁卯元日试笔》已初露锋芒，到十七八岁就下笔千言了。后来，父亲客死异乡，家道中落，他更加刻苦，以求得一条荣身之路。他25岁应童子试，以五经见拔，这是对他读书成果的一次检阅。他倦于进取以后，卖文为生，此时，写文章已成为他养家糊口的唯一手段。这意味着他的创作不能像其他作家那样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而在质和量上有着特殊的要求：质量高才易于脱手，销路才畅；数量多，才能换得较多的金钱，免除全家的饥寒之苦。由于下层市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是戏曲、小说，因而在创作上，他的传奇《十种曲》和拟话本小说成就较高，时人对之备加赞许。石鲸在《柬李笠翁》书中称：“《怜香》、《风筝》诸大刻，弟坐卧其中旬日矣。丹铅匝密，评赞如鳞。每食必藉以下酒。昨者偶失提防，竟为贪人攫去，不啻婴儿失乳。敢向左右再乞数册，以塞无厌之求。得则秘枕，虽同寓诸子垂涎，不使入帐也。”^⑨这里把他的传奇与可以下酒的《汉书》相提并论，又喻之为婴儿之乳，求之不得者竟不告而取，由此可见，他的传奇当时何等珍贵！李一贞在给李渔的信中说：“焚香啜茗，拂几静阅《无声戏》，大则惊雷走电，细亦绘月描风，总人间世未抽之秘，不啻骇目荡心已也。昔人云，施耐庵《水浒》成，子嗣三世皆暗。仆甚为足下危之。虽然，旁引曲喻，提醒痴顽，有裨风教不浅，岂破空捣虚辈可同日语也。国门纸贵，信然信然！”^⑩人们将他的小说与《水浒》齐观，国门因而纸贵，可见影响之著，流传之广。

李渔有《十种曲》传世，即《玉搔头》、《怜香伴》、《风筝误》、《意中缘》、《蜃中楼》、《奈何天》、《比目鱼》、《凰求凤》、《慎鸾交》、《巧团圆》。其中多为喜剧，以《风筝误》为代表作。这些作品都本着劝惩和愉悦的目的，从现实生活取材，从不同侧面反映社会生活。近代戏曲大师吴梅认为“科白之清脆，排场之变幻，人情世态，摹写无遗，此则翁独有千古耳”^⑪。他高度评价李

渔的戏曲成就，推许李渔为有清一代第一人。李渔的《十种曲》不仅风行海内，盛演不衰，而且在清代乾隆时期就传到日本，被译成日文，有些还被译成拉丁文流行于欧洲。日本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青木正儿说：“德川时代之人，苟言及中国戏曲，无不立举湖上笠翁者。”^⑫美国当代作家艾利克·亨利说：“正像阿里斯托芬、乔叟和莫里哀是我们的，李渔也是我们的。”^⑬所以，李渔是一位有世界影响的戏曲家。

李渔的小说创作主要是白话短篇小说集《十二楼》和《无声戏》。（《无声戏》又名《连城璧》。长篇小说《合锦回文传》经“铁华山人重辑”，已非笠翁原璧。《肉蒲团》虽有学者属之李渔，但仍无直接证据。他的文言小说有《秦淮健儿传》、《义士李伦表传》等，数量不多。）这两部拟话本小说集共收短篇小说三十篇，有其独特的风格。李渔的小说和与他同时期而稍前的冯梦龙、凌濛初辑、作的小说相比，虽浑朴自然、细腻熨贴有所不及，但其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构思的精巧、情节的曲折、文字的通俗浅显以及特有的喜剧风格，均非冯、凌二氏所能企及。况且冯梦龙只是纂辑，并非创作；凌濛初虽“演而畅之”，然又多有所本，不比李渔一空依傍，自出机杼，又能标新立异，独辟蹊径。故此，李渔是继冯梦龙、凌濛初之后的又一通俗小说作家，他把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李渔还有《笠翁诗集》和《耐歌词》，留下各体诗词一千余首。其中不乏一些抨击动乱现实、反映民生疾苦的“金刚怒目式”的诗，也有一些描写田园风光、山水名胜的清丽之作。但他的诗词总的成就不高，主要是由于多为遵命奉和的应酬文字以及抒写个人怀抱、情趣的游戏之笔，格调不高；虽然艺术技巧亦有值得称道之处，但终难与传奇和小说相比。不过，他毕竟创作了数量可观的诗词，称之为明清之际的诗词作家亦无不可。

李渔的《论古》一书，又称《笠翁别集》，包括史论一百三十

余篇，一事一议，篇幅短小而多有创见，“有翻案，有定案，不执己见，不依人墙宇”^⑭。他敢于疑古翻新，借古讽今。他为东方朔翻案鸣不平，明确表示：“人谓武帝名臣当首推董仲舒、汲黯。予谓东方朔立朝，风采不在二臣下。”^⑮他正确评价了东方朔的品行、学问和功劳，言之有据，颇有创见。他还举历史上管仲与鲍叔交谊中管仲分财利多自与的史实，发出“此风倡后人争效，鲍叔寥寥管仲多”的慨叹^⑯，讽刺人心不古的世态。因此，李渔又不失为一个有见地的史论家。

李渔著述中成就最高的当推《闲情偶寄》。这是他的美学思想和人生经验的结晶，其中精华与糟粕并存。《声容部》讲相女选美，《颐养部》谈吃喝玩乐，里面虽有合理成分，但思想庸俗，情趣低下，实不足取。《词曲部》、《演习部》和《居室部》则体现了李渔的戏曲美学思想和园林美学思想，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词曲部》和《演习部》主要是编剧和导演理论，表现了他的文艺观和导演艺术。他主张戏曲要反映现实、劝善惩恶，要努力创新、注重机趣，又要通俗浅显、吸引观众；具体创作则要求线索明晰，头脑突出，细针密线，天衣无缝；戏曲的内容要符合人情物理，又要新鲜奇特；形式要随物赋形，语言要深入浅出。这些论述，前无古人，奠定了李渔古代杰出戏曲美学家的地位。他的导演理论强调选好剧本、物色演员、指导排演、深入角色，等等，包含了戏剧导演学的主要内容，而且初具规模，自成体系，在我国戏剧理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必须指出，这些戏曲理论是李渔长期从事戏剧创作和指导演出的经验总结，也就是他从事“俳优”这一“贱业”的副产品。人们歧视他的贱业，然而，他在戏曲理论上的崇高地位却是由此而来的，这不是悲剧造就了天才吗？他在园林美学方面也是颇有建树的。他主张因地制宜，经济实用；强调创新，追求别致；崇尚自然，反对雕斫；提倡借景，注重变化，等等。这都足以证明，他不愧是一位园林艺术家。他精心营

构的伊山别业、芥子园和层园，是他园林美学思想的生动体现。同时，也正是由于他遭卖山、卖园之厄，才丰富了他的园林艺术。

李渔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出版家。他在寓居金陵期间经营的“芥子园”书铺，蜚声海内。芥子园刻印的书画精良美观，自制的笺筒也极雅致。该书铺除了印行李渔自己的诗文、小说、戏曲、杂著之外，还印行过《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金瓶梅》四大奇书和《芥子园画传》等。李渔离开南京以后，芥子园几易其主，书铺还延续了将近二百年。现在，凡芥子园刻本均列为善本书，李渔在出版史上的地位也是不容低估的。

有资料表明，他在书法、绘画、教育、建筑、烹调等诸多领域都造诣颇深。

总之，李渔的天才是多方面的。他不仅是诗人、词人、戏曲家、小说家、史论家，还是戏曲理论家、园林艺术家、出版家。这样的天才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不可多得的。然而，这是一个饱尝艰辛、历尽磨难的天才，又是一个为人所不齿的天才，因而，他是一个悲剧的天才。

悲剧的延续

司马迁曾在《太史公自序》中写道：“要之，死日而是非乃定。”^⑩这与我国尽人皆知的“盖棺论定”的古语是同一意义。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伟大的历史学家、伟大的文学家的精辟见解，还是天经地义的格言、俗语，在评价李渔的问题上，却出现了差错。李渔的不幸在于悲剧命运不仅伴随着他的生前，而且延续到他的死后，乃至盖棺三百多年后的今天。

李渔一生没有固定职业，“游荡江湖，人以俳優目之”^⑪。这若是时人对他以演戏为职业所持的一种偏见，倒也情有可原。但是，有人对他的一些弱点进行不切实际的夸大并由此进行指责、攻击，

恶劣影响风靡于他的一生，是十分可怕的；蔓延于他的身后，又是十分可悲的。

首先对李渔发难的是与他同时代的袁于令，他说：“李渔性齷齪，善逢迎，游缙绅间，喜作词曲小说，极淫褻。常挟小妓三四人，子弟过游，使隔帘度曲，或使之捧觴行酒。并纵谈房中，诱赚重价。其行甚秽，真士林所不齿也。予曾一过，后遂避之。”^①他讲得活灵活现，仿佛亲见亲闻，因而颇能迷惑一些人。果然，比李渔稍后的董含也跟着鸚鵡学舌，他说：“李生渔者，自号笠翁，居西子湖。性齷齪，善逢迎，遨游缙绅间，喜作词曲及小说，备极淫褻。常挟小妓三四人，遇贵游子弟，便令隔帘度曲，或使之奉觴行酒，并纵谈房中术，诱赚重价。其行甚秽，真士林所不齿者。余曾一遇，后遂避之。夫古人绮语犹以为戒。今观笠翁《一家言》，大约皆坏人伦、伤风化之说，当堕拔舌地狱无疑也。”^②他比袁于令有所发明，从人品攻击到作品，从生前诅咒到死后，比较全面。此后，清代道光年间的杨恩寿在他的《词余丛话》中，引用了董含的部分评语并有所发挥：“李笠翁性齷齪，善逢迎。常挟姬三四人，遇贵游子弟，便令隔帘度曲，奉觴行酒，并纵谈房术，诱赚重价，盖轻薄厚于天性，宜其文章纤巧、谑浪，纯乎市井也。”^③他由道听途说的人品评价联系到了李渔的文章风格。后来，攻击李渔者代不乏人。据《纳川丛话》载：“诋笠翁尤甚者为袁随园。然随园之为人，与笠翁亦不过50步百步之分耳。”^④近代人蒋瑞藻则在肯定李渔传奇成就的同时否定其人品：“然其为人，实猥薄无耻，又工揣摩，时以术笼取人资。”^⑤由此可见，在李渔死后二百多年间的封建社会里，他一直受到人们的毁谤。悲剧并没有随他葬入坟墓。

解放以后，由于鲁迅曾有这样的说法：“例如李渔的《一家言》，袁枚的《随园诗话》，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⑥于是，“帮

闲”、“弄臣”之类的称呼又加在了李渔的头上。50年代，一位对小说戏曲颇有研究的学者曾郑重地说：“腐化的生活作风，挫伤了这位艺术天才。”于是，不少人在李渔的生活作风上大做文章，过多地看到他“腐化”的方面，从而有意无意地贬低了他的成就与贡献。现在，仍有不少论者认为李渔是“有文无行”的文人，仍然沿用以道德、伦理的评价代替历史、艺术的评价的做法，没有客观、科学地评价他的成就。李渔的悲剧还没有结束。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对李渔应该像对待任何历史人物一样，只能加以历史的评价。如果对历史人物生活的社会历史环境置之不顾，视而不见，那么所作的评价必然是偏颇的。李渔身上确实存在一些严重的缺点，如妻妾众多，寻花问柳，这是论者指责他的主要方面。但这不仅与他本人的情趣庸俗有关，而且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重要联系。晚明以降，程朱理学受到冲击，“人情”、“人欲”得到相应的肯定，买婢蓄姬，放荡挥霍，在士大夫阶层蔚然成风，风流韵事层出不穷。如果离开这样一个具体历史环境去一味指责李渔生活作风放荡，未免有苛责古人之嫌，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

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必须对他作出全面的评价，简单化、片面化都是不可取的。鲁迅说过：“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②然而，对于李渔的评价，很多人往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的人抓住他晚年所写的《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认定他惯于打抽丰，对他早年的不屑求人、耻于干谒却熟视无睹。这样，似乎言之凿凿，铁案如山，却没有联系他思想演变的过程以及写这封书的具体环境去全面考察。如果了解了李渔移家杭州后贫病交困、走投无路的惨况，以及他“老来颜面厚于初”的思想动态，恐怕就不会以偏概全、武断地下结论了。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论断往往都是由于抓住片言只语大做文章，而没